

危机下的转机*

——抗战时期的陕西机制面粉业

王荣华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陕西机制面粉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不但体现出厂数多、规模大、产量丰、人员多、地域广等特点,而且是在中国面粉业整体衰退中逆势而起,在“危机”下实现“转机”,从而基本确立了陕西在西北机制面粉工业中的中心地位。究其原因,则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西北的地位陡然上升,开发西北热潮涌动,西安政治地位亦随之提升;陇海铁路相继通车至西安和宝鸡,起到了基础性带动作用;工厂内迁带来了设备、技术、人员等,刺激了新厂的建立并保障其正常运转;大量的内迁人口进一步扩大了面粉市场;小麦的稳步增产则为面粉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供应。

关键词 抗战时期 陕西 机制面粉工业

关于近代中国机器面粉工业的发展,一般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破落时期^①,或曰是因战争动乱造成的中国面粉业衰退和困难加深时期^②,与近代西北尤其是陕西面粉工业发展事实不尽相符。战争造成中国机制面粉业整体衰退、困难加深,而局部地区如陕西却表现出与此迥然不同的特点,并未止步不前,也并未因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而“衰退”、“破落”或“困难加深”,反而随着危机的逐步加深,表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无论厂数、产销量还是设备、从业人员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可以说,正是民族危机的空前高涨这一大的背景给陕西机器面粉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那么,这一转变有哪些表现,是何原因促成了这一转变,这种转变为什么会出现在抗战时期?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以往学界对此较少瞩目^③,笔者以

* 文章写作中承蒙南京大学历史系马俊亚教授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专家学者亦有批评指正,特表谢意。

①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徐新吾、杨淦、袁叔慎:《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历史概况与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第60—65页。

③ 如,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十章第二节“西安的面粉工业”(该书第305—310页),岳琰:《抗日时期的陕西工业》(《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93—98页)及《抗日时期内迁企业对陕西工业的影响》(《开发研究》1989年第5期,第63—65页)等。

陕西省档案馆所藏面粉业档案资料为主,参考其他文献资料,对此问题作一全面梳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抗战前陕西机制面粉业概况

机器面粉工业是近代中国位列纺织业之后的第二大民族产业,自19世纪末开始设厂至新中国建立的50余年间,先后建立的面粉厂有700余家^①,但这林林总总的面粉厂有一个自始至终未能克服的缺点即是“分布情形很不合理。主要制粉区,并非以粉为主食,更非为原料生产地;而以面粉为主食的区域,又不尽靠机粉,机粉流入农村的数量极少,而农村所消费的仍为土粉”。^②这段话道出了中国面粉业的一个面相,并非专指陕西一省而言,但在陕西表现得较为明显。

在机制面粉厂出现以前,陕西面粉业与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正处于漫长的手工业磨坊时代,加工场所主要是传统的旧式磨坊(或作磨房),磨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旱磨,一是水磨。旱磨以畜力或人力为原动力,带动石制磨盘以磨制面粉。利用水力为动力磨制面粉者,是为水磨。磨坊为手工业经济的一种形态,磨坊之性质,系商店与工场之联合体,大多备磨一二具或二二三具,以牲口转磨,磨麦成粉,或磨粉制面出售,规模甚小,销售区域多以本地为限^③,一天一套磨(一人一畜)可磨麦一石,约产粉100斤。^④西安《推磨》诗生动传神地刻画了农家女子利用旱磨磨面的场景:“老牛力尽喘东风,耕汗难消借暖烘。明日早粮今夕磨,推来半是女儿功。”^⑤1911年,西安城内有旧式磨坊200家,所磨面粉可供十七八万人食用。^⑥彬县、长武、兴平、礼泉、乾县、凤翔、岐山等地也是面粉主要产地,除供本地食用外,且运销西安。^⑦渭南在粮棉收购旺季,坐商、行商多达3500余人,面粉常供不应求。^⑧

1914年,西安出现了首家机器面粉厂,但只是昙花一现。其时,西安官绅集资15万元合办了一家面粉公司,制粉机系由上海购入的美式机器,1914年一二月间开始营业,但“因每月平均折损五六百元”,遂停产。^⑨此后,陕西机粉工业沉寂多年,未有创设,直到1933年孔道斋在渭南建立西北聚记打包面粉公司,资本额30万元,工人69人,钢磨3部,日产面粉290袋。^⑩

1935年初,在开发西北、振兴实业的呼声中,山东实业家苗星垣决定将处于战争前沿及越来越不景气的济南成丰面粉公司扩展至西安。同年8月,苗星垣在西安市玉祥门外购地29亩(后扩至44亩),兴建厂房,1936年1月完工,2月1日正式营业,是为西安成丰面粉公司。公司原定资本40万元,后增为60万元,1940年增至76.3万元,1941年又增至136.33万元。动力方面,有英国产管

①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前言”,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②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12页。

③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21页。

④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3页。

⑤ 王荫樵:《西京指南》上册,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1年印行,第49页。

⑥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印:《西安市私营磨粉业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资料》(初稿),1959年油印本。

⑦ 西安市工商联:《解放前西安市的粮食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2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⑧ 丁剑民:《象峰面粉厂改造纪实》,《渭南文史资料》第4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59页。

⑨ 刘安国:《陕西交通学要》(1925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621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陈光焯:《西京之现况》,西京筹备委员会1933年版,第8页。

⑩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编印:《全国工矿资料》,“全国机制面粉工业概况统计表”,1950年铅印本,第262—278页。

子式锅炉1部,2000千瓦发电机1部,300匹马力引擎1部,透平发电机1部,初时装旧式钢磨8部,后又加装新式钢磨12部,美式筛麦机4部,英式清粉机3部,麸皮机3部,美式润麦机1部。该厂由苗星垣任经理,王扶九为厂长,职员46人,工人132人,每年需小麦约20738200余斤,由本厂自渭南、兴平等地自购自运,每天制粉3000余袋,可年产梅蝠、双鹿牌面粉344615袋^①,随产随销,开业当年盈利21万元,1940年盈余527655.72元。^②该厂规模较大,功能齐全,除了为职工提供膳宿外,还有中西医诊所、职工子弟小学、浴室、理发室、图书室、篮球场等,亦免费提供服务。此外还开设补习班,为工人补习科学文化知识。^③

同年,华峰面粉公司从开封迁至西安设厂。该公司位于西安北门外车站北,交通便利,占地24.8亩,资本30万元,1941年增至60万元,1936年4月正式营业,全套机器除英国产2座锅炉外,余系德制,有新式磨粉机12部,原料以兴平、礼泉、渭南、绛帐等地所产小麦为主,年需2500万斤左右,自购自运。公司有职员45人,工人165人,每月可产华山牌面粉7.5万袋,每年产量36万—37万袋。^④成丰、华峰所产面粉行销西北各地,供不应求。^⑤据统计,至1936年,陕西有机制面粉工厂3家,资本总额为93万元,日产能力为7490袋。^⑥

二、抗战时期陕西机制面粉业的快速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战局的变化,沿海沿江工业中心相继沦陷,而恰在此一时期,陕西机制面粉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面粉厂相继在各地涌现。战时陕西机制面粉厂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内迁,一是新设。

抗战前,中国的机器面粉业已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分别形成了南以上海、北以哈尔滨为主的面粉工业中心。据统计,1936年全国面粉厂实存169家,资本总额为6821万元,日产能力为51万袋,其中上海与江苏占34.5%,哈尔滨与东北其他地区占34.3%,其余各省市占31.2%。^⑦

抗战爆发后,为减少损失,支援抗战,以免沦陷工业落入敌手以资敌,国民政府决定尽可能将沿海沿江工业向西迁运。内迁企业以迁入西南地区最多,西北地区则因交通、原料等因素只限于陕西和甘肃两省,其中又以陕西迁入最多。机制面粉工业即属于内迁工业之一。迁陕面粉厂共有6家,分布在西安、宝鸡、渭南和褒城4个交通便利、原料丰富的市县。迁入西安的是泰记和合面粉公司,该公司1933年2月创立于河南许昌,1938年11月迁陕,1941年4月改组复工,资本100万元,经理毛虞岑,主要设备有英国产45匹马力煤气机1部,木炭引擎2部,钢磨3部,职员

① 原文数字如此。因战时特殊情况,加之原料供应、磨制军粉、维修机器等因素,各厂皆存开工不足的情况,各厂每年开工日数不同,年产量不能简单叠加,以下各厂情况基本相同。

②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20—21页。

③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21页;晋震梵:《西安成丰面粉公司及面粉业概况》,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北近代工业》编写组编:《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0—417页;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西京市工业调查》,1940年,第16—17页;陈宏绪:《成丰面粉公司》,《西北经济》第1卷第1期,1948年3月15日,第40页。

④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45—46页。

⑤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扶轮日报社1937年版,第17章第12页;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西京市工业调查》,第178—179页。

⑥ 林刚:《对1927—1937年间中国机器面粉工业的若干考察》,杜恂诚编:《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⑦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前言”,第4页。

32人,工人64人,年需小麦4.5万包,年产和合牌头等粉32500袋,二等粉87500袋,四等粉3万袋,主要销于本地。迁入渭南的是同兴面粉厂,褒城则有三泰面粉公司,而以位于宝鸡的大新面粉厂迁入最早,福新五厂宝鸡分厂规模最大。大新面粉厂原设于河南漯河,1938年10月迁于宝鸡,在十里铺购地70余亩建筑厂房,1939年7月13日正式开工生产,原厂资本10万元,1940年增为30万元,1941年增至90万元,职员34人,工人46人,有英国产200匹马力蒸汽机1部,英国产132匹引擎1部,德国产32千瓦发电机1部,国产34匹水泵4部,德国产钢磨5部,所需原料从本地及虢镇、绛帐、凤翔等地购进,年需小麦7万余包,年产面粉20万袋,主要销于汉中和西安。^① 1939年迁入的是福新系统第五厂,该厂原系荣氏家族企业,1919年设于武汉,资本额30万元,钢磨22部,可日产面粉6000袋,是福新系统的一个大厂,资本雄厚,产量丰富。至1936年时,该厂资本额已达150万元,拥有钢磨38部,工人180人,日产面粉11200袋,全年产量为2469880袋。^② 该厂于1938年8月底从武汉由水路迁运,主要设备有12部大型钢磨和3000千瓦发电机组,但在迁运途中,一套1000千瓦发电机沉于汉水,损失较重。1939年,剩余设备运至宝鸡,存放于当地窑洞,1941年11月中旬复工,职员13人,工人60人,年需小麦40余万担,购于本省各县,可年产面粉60余万袋。^③ 其所产面粉除供申新、福新两厂自用外,尚可售于宝鸡附近,因品质甚佳,乐为人所购用。^④ 该厂附属设施有子弟学校、补习学校、医院、农场、消费合作社、书报室、娱乐室、运动场等。^⑤ 1943年迁入的是福豫面粉公司,该公司原系李晓东1937年2月筹设于郑州,机器设备从德国礼和洋行订购,7月厂房完工时,适逢抗战全面爆发,未能开工。后因零件不齐,一直延宕至1941年6月。1941年10月郑州发生紧急战事,遂奉令于1943年2月迁陕。1944年1月在西安北关复兴路购地建筑厂房,5月完工后即安装设备,并增资至3000万元。1944年9月试机开工,设备计有195匹马力蒸汽机1部,60寸钢磨1部,40寸钢磨2部,30寸钢磨3部等,每日需麦10万斤,购自陕西陇海路粮食集散市场,平均每日可产面粉1344袋,全年产量106959袋,销于西安市及外省。^⑥

除了内迁面粉厂外,战时陕西各地尤其是西安还掀起了兴建面粉厂的热潮。就性质言,新建面粉厂中既有官僚资本面粉厂,亦有民族资本所开设,但以民营厂为主。就数量而言,新设厂数较战前有明显增长,达到14家。如1940年成立的西北纺建公司第一面粉厂,有工人96人,可日产面粉1040袋;以后西安又陆续开办了“永丰”、“裕丰”、“宝成”、“建中”等面粉厂。^⑦ 永丰面粉公司1943年10月设立于西安玉祥门,资本额300万元,经理为江苏人于松乔,职员16人,工人50人,双滚钢磨4副,化学钢磨14部,年需小麦720万斤,购自陕豫二省,年产面粉12万袋,销于陕省。^⑧ 渭南象峰面粉公司1941年8月开工,职员22人,工人26人,年产面粉6万余袋,年需小麦2.6万余石,购

①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58—59、35页。

②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附录一:旧中国机制面粉工厂一览表”,见该书第222页;“表122 茂新、福新各面粉厂发展的规模”,见该书第186页。

③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74页;《内迁工厂已相继复工》,《陕西汇刊》第5卷第8、9、10期合刊,1941年8月,第95—96页。

④ 郑延韶:《宝鸡大新面粉厂简史》,《宝鸡文史资料》第5辑,宝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编印,第94—95页;许济航:《陕西省经济调查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354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⑤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75页。

⑥ 《福豫面粉公司营业计划书发起人姓名、经历及认股数目、收支对照表、章程、股东名簿及本厅批文等》,陕西省档案馆藏,72—3—534。

⑦ 《第一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90—4—98;《同业公会面粉厂公会章程及会议记录等(一)》(1945年),82—1—1060—1,第4页。

⑧ 《永丰面粉厂有关工厂登记甲乙两种表》,陕西省档案馆藏,72—3—420,第14—21页。

自渭南、蒲城、白水、大荔各县,动力设备25匹马力,苏联产钢磨5部,煤气引擎2座,每年可盈余6万元。三泰面粉公司,位于褒城,经理徐滋叔,1942年7月迁陕后复工,职员10人,工人20人,年需小麦3万包,销量10万袋,行销汉中一带,每年盈余20万元。^①渭南除了象峰面粉厂之外,还建立了利民、瑞昕两个厂,但利民、瑞昕二厂因出粉率低、质量差、销路窄等原因,开业不久即告停产,只剩下战前建立的聚记和战时的象峰两个厂,直到解放。可惜的是各厂资料不全,现根据有关记载,将战时陕西新建面粉厂概况整理如表1。

表1 战时陕西省各类(官僚资本、民族资本)面粉厂概况统计表

名称	设立时间	厂址	创办人或负责人	资本额(万元)	职工人数	动力设备		钢磨(部)	日产量(袋)
						电动机(部)	马力(匹)		
象峰面粉公司	1941.8	渭南	李百朋	30	70	2	25	6	300
西安面粉厂*	1940	西安			24	3	55	7	480
西北纺建公司第一面粉厂*	1940	西安			96				1040
雍兴公司岐山面粉厂*	1940	岐山	吕凤章	500					300
战干面粉公司*	1941	西安	吴彰耿	5.2					
晋丰面粉厂	1942	西安	曹彬、荆雨生	20				3	200
民丰面粉厂	1943	西安	牛揖唐、贾晓农	285	37			3	100
永丰面粉公司	1943	西安	于松乔	300	70		51	5	600
复兴面粉厂	1943	西安							
福中面粉厂	1943	西安							
宝成面粉厂	1944.3	西安	闻谋广、吴建本	250	25	1	30	3	280
同丰面粉厂	1944.3	西安	董子丰	150					
福利面粉厂	1944	西安			74	1	80	4	370
明德面粉厂	1944	西安							
建中面粉厂	1945.11	西安	吴宝山	3000	30	木炭引擎1	105	6	90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239—272、281—283页;《第一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90—4—98,第75页;《西安市各工厂向经济部呈请工厂登记及附表(一)》(1945—1946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640(1),第12—20页。

说明:有*者为官僚资本面粉厂。

^① 《面粉厂、火柴业工厂有关情况登记表》(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3—249,第20—32页。

抗战军兴,为陕西机器面粉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前方军需需要孔急,各厂皆有磨制军粉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陕西机制面粉业的正常发展。^①

通观战时陕西机器面粉业的发展,与战前相比可以说成绩斐然,所设工厂数量有了快速增长,大中型工厂新增14家,加上战前所设3家及战时迁入5家,共计22家,增加了近7倍。这可能是中国近代机制面粉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就西北、西部而言不为过。

面粉业的壮大使得成立同业公会成为可能。1940年10月5日,于乐初、李国伟、祝伯柔等发起成立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公会,该会“以谋工业之改良发展及矫正同业之弊害为宗旨”,初时只有7家会员单位(成丰、华峰、和合、大新、福新、象峰和三泰)24人,1943年增为8家,1944年10月会员单位发展至12家,新加入的有福豫、永丰、宝成和同丰4厂,1945年3月蔡家坡雍兴公司面粉厂加入,11月建中面粉厂加入,至此会员单位共计14家,5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会员人数达53人^②,同业公会的成立及壮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陕西面粉业的快速发展。

再就分布地域而言,亦较广泛,西安、宝鸡、渭南、褒城、岐山等多个市县都设立了机器面粉厂,其中西安市厂数最多。产量方面,也比战前有了长足进展,尤以雍兴公司岐山面粉厂和福新五厂宝鸡分厂为大,年产量达二十六七万袋。这还是在有些厂家开工不足的情况下的统计,如果机器面粉厂与小型面粉厂全部足年开工,则年产量可达660万袋,每袋以42斤计,为2.77亿斤。^③销场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豫、皖各省及陇海路沿线各大城市和商埠。表2反映了1941年至1945年陕西主要机制面粉厂产销情况。

抗战胜利后不久,全国很快陷入内战的深渊,以至物价飞涨,投机猖獗,机制面粉业也不例外,上海、武汉、重庆、西安等城市游资充斥,小型面粉厂应时而起。据统计,从1946年至1949年,全国新设面粉厂131家,平均每年设厂37.4家,但规模较小,全部新厂平均日产面粉509袋。其主要集中在武汉、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等大城市,达89家,占总数的68%。^④西安在此一时期兴建了多家小型面粉厂,尤以1948年建立最多。另据统计,“中华民国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9个区的219家面粉厂中,第一区陕西省有14家,每天可生产面粉21700袋^⑤,这些面粉厂钢磨数量相对较少,设备简陋,产量较低,但也适应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有一定市场。但因开工不足,1948年,西安各厂实际年产量220万袋。^⑥

^① 《本局关于磨制军用、民用粉管理暂行办法、机制粉分商组织及取缔面粉囤积居奇实施办法等文件(一)》(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17-6-1049(1);《华峰面粉公司呈报有关磨制军粉情形等文件(一)》(1941-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17-6-421(1);《华峰面粉公司呈报有关磨制军粉情形等文件(二)》(1941-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17-6-42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通讯(上)》,《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第56页。陕西磨制军粉始于1938年下半年,大公司(日出面粉3000袋以上)每月20天,中等公司(日出面粉500袋以上)每月18天,小公司(日产不足500袋)每月17天,其余时间为磨制民粉时间,不得自由营业。军粉磨制对象主要有粮秣处、驻陕军粮局、驻豫军粮局等,还有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第三十七工程处这样的机构。参见《本处1945年有关面粉配销等文书(二)》(1945年),陕西省档案馆藏,92-4-32(2)相关内容。此外,各公司还要为粮政局、陇海路员工消费合作社、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等单位磨制面粉。这种各自为政、“麦出多门”的局面,极易出现停机待料的不经济现象。参见《华峰面粉公司配发各机关、学校、团体、工厂面粉数量报表(下)》(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17-5-346,第7页。当然,在国难当头之际与民族存亡时刻,全国的各项措施应为抗战大局服务,但磨制军粉影响陕西面粉业的发展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② 《第一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90-4-98;《同业公会面粉厂公会章程及会议记录等(一)》(1945年),陕西省档案馆藏,82-1-1060(1),第4页。

^③ 尹仁甫:《陕西机制面粉业之前途》,《陕行汇刊》第7卷第6期,1943年12月,第9-10页。

^④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5页。

^⑤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409-410页。

^⑥ 转引自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82页。

表2 陕西部分机器面粉厂产销概况表

公司名称	设立地址	收购小麦数量(市石)						出粉量(袋)						供应地区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历年平均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每年产量估计	
福豫	西安	—	—	—	—	94906	—	—	—	—	70899	131628	101264	西安
永丰	西安	—	—	—	—	—	34483	—	—	4722	96610	80403	60578	西安
成丰	西安	—	34202	10416	17682	52890	28798	301011	244436	未开磨	250960	208201	251152	西安
雍兴	蔡家坡	—	—	—	—	114826	—	—	—	—	68275	263948	166112	蔡家坡、宝鸡、西安
福新	宝鸡	21120	113965	28712	53663	53832	54258	38375	303446	155089	213328	—	177560	宝鸡至西安沿陇海路各县
大新	宝鸡	75735	—	—	—	—	48789	217519	219312	171611	257261	170131	207167	宝鸡、西安
象峰	渭南	63364	—	—	—	—	—	14829	27152	23763	33983	69381	33822	渭南、临潼、西安
三泰	褒城	—	13565	10473	30914	11230	16545	—	—	30664	38831	31619	33704	褒城、南郑

资料来源:李国桢主编:《陕西小麦》,美吉印刷社1948年版,第33页。

原表说明:1. 本表系陕西省农业改进所1946年8月通讯调查结果,公司多未能详细填写,故结果欠完善;2. 各公司成立年份:福豫1944年4月开始制粉,雍兴1944年8月开工,余则不悉。又福记公司设于西安,未填写调查表;3. 数字只有一年的,未予平均。

三、战时陕西机制面粉业急速发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有人在评述陕西面粉厂的分布时,指出其特点有四:一是集中于铁路沿线,二是便于利用水力之地,三是人口集中之地,四是拥有工具、技术和人才。而西安、宝鸡此四点皆备,因此这两地面粉厂最多。^①这一评论自有见地,但其第二点“便于利用水力”,显然指的是水磨,而非机制面粉厂,姑且不论这一点,另外几个原因,确有进一步申述的必要。

(一) 陇海铁路的带动作用

在陇海铁路修至潼关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后,各种农产包括小麦无法及时运出,如20世纪20年代早期,陕西小麦供过于求,价格不及上海1/4,但因交通不便而无人问津。^②“国内交通不发达,缺乏流通性,致局部的剩余,局部的缺乏,不能互相调剂”,“交通之影响于农产品之贩运买卖其巨”。^③1930年11月,陇海铁路灵宝至潼关段开工建设,1931年12月底完工通车。1932年8月,陇海路潼关至西安段正式开工,1934年12月完工通车,其时“居民惊喜相告,金谓此后工商业之调剂盈虚,将惟运输便利是赖”^④,陇海铁路展筑至西安后,“该省始渐为人所注意,远见之士,乃相率

① 尹仁甫:《陕西机制面粉业之前途》,《陕行汇刊》第7卷第6期,1943年12月,第9页。

② 蔡受百:《中国麦产及面粉业概况》,《国闻周报》第1卷第4期,1924年,第16页。

③ 曹慎修:《中国土地问题之研究》,明日书店1932年版,第99页。

④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3年版,第451页。

至西安、咸阳一带,经营工商业”^①,铁路沿线城市日渐繁荣,逐渐成为西北工业重心。^②时人评述道:“当陇海铁路尚未通达潼关之前,陕西之经济及社会状态实与今日之甘肃、青海相似,及铁路通达潼关而陕西情形一变,及通车至西安而更大异于从前矣。”^③1935年陇海铁路通车后,渭南的面粉业也得到新的发展,西安、天津、徐州、郑州、济南、开封等地面粉厂派人前来收购小麦^④,铁路沿线先后建起了纺织、面粉、火柴、化学榨油、机器制造等一系列近代工业,极大地带动了西安乃至西北商业的繁盛。1935年1月,西安至宝鸡段开工,1936年底完工,相应地带动了宝鸡经济的发展。“宝鸡在陇海铁路未到达前,仅一普通县城,至为敝陋,城内不过有资本微薄之商号百余家,自民国二十五年铁路通至本城后,商业始渐繁盛,迨抗战军兴,川陕甘各线公路相续修成,宝鸡当陕甘之要冲,扼南北交通之枢纽……更有迁建之工厂多家,形成西北工业区域,现宝鸡工商业之盛,仅次于西安。”^⑤抗战爆发后,内迁工厂很多就是经陇海铁路抢运至陕西以至后方的。^⑥因此,在分析陕西面粉业快速发展时,陇海铁路极大的带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 工厂内迁的刺激

如前所述,抗战时期陕西机制面粉厂的重要来源是内迁和新设,其中内迁工厂的作用不可小觑。被外人称为“奇观”^⑦的工厂内迁,开始于1937年七八月间,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工厂639家,由国民政府助迁者448家。其中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业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46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器材共计12万吨。迁陕42家,占总数的9.4%。^⑧自1938年至1940年,先后到达陕西的机械、纺织、化工、文教、电器等技术人员达730人左右。^⑨据1939年9月统计,来陕避难技术人员有15人,主要分布在公路、机器、制药、面粉等行业。^⑩据经济部工矿调查处统计,1943年底陕西有工厂343家(未登记及规模较小者未列入),1938—1943年间成立的有252家(其中1938年成立22家,1939年44家,1940年46家,1941年75家,1942年45家,1943年20家),成立时间未能确定者19家,资本总额据经济部统计处1942年底的数据为61702561元,平均资本额为179891元,行业分布亦较广泛,涉及电力、冶铁、五金制造、面粉等35个门类。^⑪独领西北之风骚。有学者指出:“这次异常的工业地域分布结构从现代化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反向空间位移,促进了西部大后方地区社会经济能够有一短暂的跳跃式的超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说,这次举国民族工业大迁徙是民国时期西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契机。”^⑫这在后方面粉业

① 许济航:《陕西省经济调查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354册,第57页。

② 《陕西省交通中心之咸阳》,《西北导报》第3卷第9期,1937年6月10日,第24页。

③ 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编:《陇海铁路甘肃段经济调查报告书》,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1935年铅印本。

④ 宋金喜:《渭南近代粮业的发展演变概况》,《渭南文史资料》第1辑,渭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渭南市水务局2002年编印,第82页。

⑤ 许济航:《陕西省经济调查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354册,第75页。

⑥ 何敏求、陈尔寿、程潞:《中国地理概论》,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74页。

⑦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6页。

⑧ 郑友揆、程麟荪、张传洪:《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另有与此不一致的统计数字,如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43年7月编印的《抗战六年来之工矿》(收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抗战建国六周年纪念丛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第328页),其数字为四川41.64%,湖南32.35%,陕西5.86%,广西4.42%。

⑨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⑩ 《1942年度建设事业费分配(一)》(1942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2—1253(1),第31页。

⑪ 许济航:《陕西省经济调查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354册,第57—61页。

⑫ 戴逸、张世明主编:《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也有充分反映。

工厂内迁促进了西北工业包括机制面粉工业在内的长足发展。以宝鸡的发展而言,20世纪20年代时,宝鸡县只是中国众多县份中的一个,除了传统的行政职能之外,工商业皆无足观,工业落后,商号600多家。^①1934年西汉公路通车后,宝鸡商业渐有起色,商号增多。1937年陇海铁路通车宝鸡之后,宝鸡渐趋繁荣。抗战爆发后,由外地迁来的工厂络绎不绝,新办工厂亦迭有增加,个体手工业也日益增多,并在周边形成了一个“秦宝工业区”,据统计,到1941年,除了机器面粉厂,迁至宝鸡的其他工厂还有申新纱厂、洪顺机器厂、华兴机器厂、民康毛纺厂、民康药棉厂等,宝鸡俨然成了西北地区、黄土高原上的工业重镇。^②以面粉业为例,抗战结束后,“一般说来,国内面粉工业都是寄足在少数几个通都大邑上的,十分偏远的地方仍旧未脱幼稚阶段……陕西虽有11家,但都是抗战时期在长江下游的各厂所迁去”。^③

抗战时期陕西面粉业之所以发展迅速,一是因为工厂内迁,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在内迁工厂的带动下,工业总体发展较快,门类齐全,推动或保障了本省面粉行业的发展,“铁路趋使机制粉厂出现,更以机器制造业逐渐发展于各地之结果”。^④如,宝鸡铁厂除了可以制造工作母机之外,还可以修理全套面粉机。成都建成面粉厂、甘肃油矿局面粉厂等处的制粉机器,均由宝鸡申新机器厂所造。^⑤位于西安的永丰面粉公司成立于1943年10月,其最大产能为每月1.5万袋,所用木炭机、钢磨皆产自西京建中机器厂。^⑥蔡家坡酒精厂改为面粉厂后,其所装设的大型机器面粉机,则由西北机器厂制造,可日产面粉500袋。^⑦渭南象峰面粉厂有些机器如打麦机、筛麦机等,则是本厂制造的。一些企业碰到技术难题,径直派人赴西安粉厂学习后加以解决。^⑧“此项建设之成效,可以民营事业所得之生产力量作为标准。……就面粉言,自每年一百五十万袋,增至四百八十八万袋,计增三倍又半。……凡此皆后方战前及民国三十一年之生产能力互相比较,而确见已有长足进步”。^⑨据统计,从1940年至1943年,陕西机制面粉平均产量占后方总产量67%,而1940年高达76%。^⑩

(三)人口增加导致面粉需求上升

抗日战争造成了中国人口的历史大迁徙,据学者研究,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口总数为9500多万人。^⑪人口迁徙的路线,“大致从东部移向西部,以长江为主途。除有一部分沿江迁入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外,大都分布于西南西北各省”。^⑫陕西是战时西北地区涌入人口最多的省

① 强寿天:《抗战胜利前后宝鸡工商业的变化》,《宝鸡文史资料》第4辑,宝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220—222页。

② 转引自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③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412页。

④ 尹仁甫:《陕西机制面粉业之前途》,《陕行汇刊》第7卷第6期,1943年12月,第9页。

⑤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1937—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10页。

⑥ 《永丰面粉厂有关工厂登记甲乙两种表》,陕西省档案馆藏,72—3—420,第17页。

⑦ 傅道伸:《我所知道的束云章和雍兴实业公司》,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⑧ 李百朋:《解放前的渭南象峰面粉厂》,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北近代工业》编写组编:《西北近代工业》,第422—423页。

⑨ 翁寿天、顾渊群:《中国经济建设与农村工业化问题》(1944年1月),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495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⑩ 宋彦科:《抗战前后之面粉工业(中)》,《公益工商通讯》第2卷第5期,1947年12月15日,第13—14页。

⑪ 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⑫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0页。

份。邻近省份如河南、河北、山西等皆有大量人口入陕,如河北战时有难民 677.4 万人,除省内各县之间互避及被敌征调出关劳工 250 余万之外,“余均流落后方各省,以陕西、甘肃、四川为最多”,河南“逃往皖、陕、甘、宁、青、新、川、冀、晋、鄂、云南诸省者,达五百二十余万”,其中陕西和甘肃是最主要的分布区,留陕难民达 200 多万。^① 1942 年豫省旱灾,此一年逃往陕省难民即达 40 余万,“实数恐尚不止此”。^② 整个抗战时期,陕西人口总数不少于 960 万人,这还不包括流动人口在内。

西安市的人口变化则更为明显。1926 年西安城市人口总数不足 10 万,1934 年底陇海路潼西段修通后,人口迅速增多,1935 年增至 29814 户、154540 人,并且仍在不断增加。七七事变爆发后,晋冀两省民众为躲避战祸,涌入者至多。^③ “西安馆毂中原,为开发西北之枢纽,人口增加尤为各大都市之冠”。^④ 1936 年近 19 万人,1937 年突破 20 万,此后除了 1939 年和 1940 年稍有下降之外,其他各年都呈增长态势,1944 年更是达到 378253 人,比 1936 年增加了 18 万有余,将近翻了一番。而据陕西省政府 1944 年统计,西安人口在本年出生 1149 人,死亡 1392 人^⑤,也就是说,1944 年西安市的人口呈现负增长。因此,此一时期西安增加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包括数量巨大的儿童。^⑥ 抗战期间是整个民国时期西安人口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抗战胜利时则达到 39 万余人,1946 年时更增至 55 万人左右,可谓极度膨胀。^⑦

除了大城市之外,中小城市、乡镇迁入的人口更多。战争时期产生的大量难民,其迁移有一定的规律,即“大率先往城市;城市不能容纳时,再入内地市镇或乡区”^⑧,因此,陕西中小城市和交通沿线成了难民的主要迁入地,冀、鲁、豫等省难民流落陕南各县为数甚多,南郑、褒城、城固、凤县、宝鸡、华阴、天水等陇海路沿线,皆有大量难民涌入,据研究,战时迁入西北各省的人口有 300 万左右。^⑨ 并且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 300 万难民大抵皆来自豫、晋、冀、鲁等小麦主产区(华北五省小麦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26% 以上^⑩,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小麦食用比例分别为 74%、85%、82%、73%),皆系食面之民(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四省农民食麦量占主要粮食的比重分别为 14%、30%、27%、19%^⑪,平均为 2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25%),因此,其对面粉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陕西机制面粉业的发展。此外,陕西、甘肃等后方省份驻军多,食用面粉量大,再加上内迁高校和中学、银行,外省各地的银楼、剧团、部队家属等,数量甚夥。^⑫ 这在三泰面粉厂得到了最好的明证。1942 年底迁建汉中的三泰面粉厂,是汉中首家机器面粉厂,两年中资本即扩大

① 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第 127—138、51 页。

② 《一九四三年农业杂项电、函(一)》(1943 年),陕西省档案馆藏,72—8—179(1),第 36 页。

③ 王荫樵:《西京指南》上册,第 19 页。

④ 《福豫面粉公司营业计划书发起人姓名、经历及认股数目、收支对照表、章程、股东名簿及本厅批文等》,陕西省档案馆藏,72—3—534,第 5 页。

⑤ 《西安市人口出生及死亡》,《统计月报》第 103、104 期合刊,1945 年 4 月,第 9 页。

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小学教育实际问题》,正中书局 1948 年版,第 160 页。

⑦ 《各城市按月户口变动统计(续)》,《统计月报》第 33 期,1937 年 7 月,第 6 页;《各大城市按月户口变动》,《统计月报》第 78 期,1943 年 2 月,第 13 页;《各大城市户口变动(续)》,《统计月报》第 117—118 期合刊,1947 年 5—6 月,第 30 页。

⑧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 2 册,第 260 页。

⑨ 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第 51 页。

⑩ 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台北,“国史馆”2009 年版,第 279—280 页。

⑪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 133—134 页。

⑫ 张文德口述,周建民整理:《忆青年军二〇六师在汉中》,《汉中市文史资料》第 8 辑,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 年编印,第 65—69 页;王复忱:《略考汉中人口》,《汉中市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162—163 页。

至1000万元,生意红火,“面粉紧俏”。^①

(四) 开发西北热潮的推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即有开发西北的提议,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开发西北的呼声更为高涨,一时间国民政府要员、学术团体甚至个人皆蜂拥至西北,进行各类考察,各种开发主张层出不穷,发展交通、开发水利、移民垦殖、发展工业是比较多地被提及的四项主张。在发展工业的设想中,有人制定了详尽的西北面粉工业发展计划,对西北面粉业分期发展所需的设备费、流动资本、原料来源及数量、面粉出产及销售数量、盈亏状况等做了详细测算,论证了西北发展面粉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描绘了灿烂的发展前景。^② 这些计划虽然限于各种因素,当时并没有立即执行,但毕竟有人在关心西北的面粉业发展,并且在此后不久的1933年,陕西渭南即设立了一家面粉厂,1935年至1936年,西安又有两家面粉厂相继设立,并且都是在“开发西北声中”迁入的。^③

在开发西北呼声和国难潮中,西安的政治地位也被大大抬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八天,即26日下午,蒋介石在听说了日本不接受国联调停,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后,慷慨言曰:“如此则暴日之凶焰将更张矣。倘与之直接交涉,或听其地方交涉,则必无良好结果,我断不能任其枭张横行,决与之决一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盖可以存我中华民族之正气与人格也。余今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军队主力于陇海路,严阵以待之也。”10月3日上午,蒋介石在与熊式辉谈备战计划时指出:“余意此次无论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着重号为原书所有——引者注)。万一首都沦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也。”^④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议将西安定为陪都,并改名为西京,组设西京筹备委员会,从事建设。^⑤ 之后,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组设西京筹备委员会,以张继为委员长。193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届47次常务会议上,提议将西安改为直辖市,“兼负建设陪都之专责”。^⑥ 这一行政上的设置,使得西安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各种建设举措次第展开,西安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人口渐增,商业趋于繁荣,面粉厂的设立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西安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是开发西北热潮中又一促进面粉业发展的积极举措。

(五) 原料供应较为充足

陕西粮食作物中以小麦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丰,为发展面粉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来源,成丰、华峰两公司原料皆购自本省。抗战爆发后,粮食需求较诸以往更为迫切,为了解决战时军需民食,陕西省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推广改良品种成效显著。战时推广的小麦品种有陕农七号、蓝芒麦、蚂蚱麦、泾阳六〇号、泾阳三〇二号和金大二九〇五号等。^⑦ 陕农七号由陕西农棉试验场用混合选种育成,比普通农家品种增产13%^⑧,1937年开始在长安细柳乡推广1237亩,后扩大至关中中部

① 蒋志德:《抗战时期“三泰”迁汉记》,《抗战时期的汉中》,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103—104页。

② 徐尚:《西北面粉工业初步计划》,《云南建设公报》第11期“西北专号”,1931年,第F17—F22页;张人鉴:《开发西北实业计划》(著者书店1934年版)第八章第五节有“面粉工业计划”,详见该书第203—213页。

③ 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西安市工业调查》,第20页。

④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101—102、128—129页。

⑤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9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页。

⑥ 蒋中正等25委员:《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9辑,第6—7页。

⑦ 仇元、孙福绥:《近年后方各省推广稻麦改良品种概况》,《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6期,1945年6月,第9页。

⑧ 中央农业实验所查作系:《中国改良小麦品种名称及特性一览表》,《面粉工业》第1卷第10期,1948年,第9—10页。

及东部各县,1939年在渭南、兴平、长安、大荔四县推广7500亩,1940年又增加咸阳一县,面积扩大为5.5万亩,到1941年,种植面积达245678亩,亩产约350斤,较当地普通农家品种增产70余斤,且成熟较早,耐霜、耐寒、秆强,粉质特佳,普通小麦每亩产三四斗,而陕农七号则产五六斗,高者达八九斗。蓝芒麦系金陵大学西北农事试验场1936年选育成功,当年开始推广,1937年大量推广,1938年种植面积760亩,1939年面积为10280亩,1940年为63252亩,1944年合计推广面积为109252亩,主要集中在高陵、三原、临潼、富平等县,亩产约350斤,平均产量超出普通农家品种19%,较当地普通农家品种增产70余斤。蚂蚱麦由西北农学院选育,具有生长整齐,抗旱、抗寒、抗病、秆健,成熟较早,品质亦佳等特点,亩产340斤,较当地普通农家品种增产60余斤,产量超出普通农家品种5.3%—27.5%,平均达19.38%,1937年在武功大量繁殖,1938年范围扩大至宝鸡、凤翔、乾县等县,1939年繁育面积为190亩,1940年推广至3200亩。金陵大学二九〇五号小麦,在陕南试种成效亦著,1941年推广面积27699亩,再加上其他地区的推广面积,1941年共推广小麦种植面积达43.96万余亩,产量每亩增加15%。泾阳六〇号及泾阳三〇二号均为陕西省西北农事试验场选育,1940年在高陵、泾阳、长安、蒲城、富平等县推广,前者亩产约300斤,较当地普通农家品种增产27斤,后者亩产240斤,增产19斤。陕西全省而言,1939年推广17265亩,1940年为182619亩,1941年为439691亩,1942年为934602亩,1943年150万亩,1944年2614421亩,1945年1845951亩,1946年1867344亩,1947年面积为2028896亩。^①据测算,良种推广后,陕西每年小麦总产量可以增加225万余担。^②陕西小麦产量呈现稳定增产之势,为陕西面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来源。

从1933年陕西设立第一家较有规模的机制面粉厂至1949年前已拥有十多家大中型面粉厂,到1949年后发展成为西北面粉业中心,陕西只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厂数之多、产量之丰,实为后方各省翘楚。陕西机器面粉业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其原因固多,以上所论皆为荦荦大端,但众多原因背后,总的社会背景则是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在在显示出其发展的独特性。除了抗战这一历史时期,这种独特性亦表现在特殊的发展动力方面,亦即是通过外来力量推动、实现的本地区发展。这种发展动力是否是后发展地区的必由之路,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王荣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编审]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本厅政绩交待比较表》,陕西省档案馆藏,72—2—235,第12页。

^② 许济航:《陕西省经济调查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354册,第54页;张绍钤、徐树基:《陕西农作物改良之成绩及今后之希望》,《陕农月刊》第2卷第2期,1941年,第10—11页;仇元、孙福绥:《近年后方各省推广稻麦改良品种概况》,《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6期,1945年6月,第8—18页。